

# 解构朝贡体系<sup>\*</sup>

张 锋

内容提要 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缺乏严谨的、系统化的理论。这一领域的经典范式还是 19 世纪之前就已在西方出现的朝贡体系。本文从提出关于朝贡体系这一范式的基本性问题出发,尝试指出挑战这一范式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从而希望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能超越朝贡体系的束缚,建立更加完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古代东亚 国际政治 朝贡体系 费正清

在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严谨的、系统化的理论的缺失。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华帝国与其邻邦之间关系的阐述性著作越来越多,但能解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论性成果乏善可陈。在这领域经久不衰的概念是 19 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西方出现的所谓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直到今天,这个概念还在从根本上影响我们阐述、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方式。

---

\* 感谢王赓武、陈兼、林春、唐世平、赵汀阳、杜赞奇、郑永年、Paul Evans、Brantly Womack 等对本文提出的批评和建议。特别感谢 Chris R. Hughes 和许田波对本文研究的支持与指导。本文曾在 2009 年 6 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赓武学术会议上宣读,感谢与会者的评论。

---

《国际政治科学》2010/2(总第 22 期)第 33—62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从这个意义上讲,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经典范式,至今还未从理论或事实上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在本文中我将对西方关于朝贡体系的文献进行批判性评价,希望能澄清基本概念,扩大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主题和视角,并提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研究方向。众所周知,关于朝贡体系的文献主要是历史学文献。从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评述它,难免会有学科不兼容的问题。我认识到历史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建立综合性理论,因此会把重点放在朝贡体系现有范式相关论述本身的价值及其对史实的诠释能力上。

长期以来,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基本上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在西方特别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东亚外交史研究的全盛时期,这主要归功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 K. Fairbank)等一代学者的开创性努力。<sup>①</sup>但是,70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对外交史兴趣渐失,外交史在史学上的地位也被边缘化,古东亚外交史成了冷门,研究人员屈指可数。<sup>②</sup>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三十年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经典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一文献的重大缺陷在于分析上的模糊和实证上的疏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代西方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检验费氏朝贡体系和中国世界秩序的框架,既指出了其潜在概念假定的问题,也提供了新的史实来证明其论述的缺陷。不过,总体而言,这些批判并不寻求新的解释性框架来替代朝贡体系范式。

另一方面,政治学者,特别是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有充

---

<sup>①</sup> 相关著作包括:J. K.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 2 (June 1941), pp. 135-246; J.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February 1942), pp. 129-149;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esp. chap. 2; and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esp. chap. 1。中译本见陶文钊编选,林海、符致兴等译《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费正清学术生涯的简介,见陶文钊《费正清与中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sup>②</sup> John E. Wills, Jr.,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Qi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Neptune*, Vol. 48, 1988, pp. 225-229, at p. 229; Michael H. Hun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42, at p. 37, fn. 14.

分的兴趣。就像欧洲国际关系史是发展并检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一样,东亚国际关系史也可以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虽然这种理论潜力显而易见,真正通过彻底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深入到这一领域的学者还不多见。一些相关著作以二手资料为基础,本身就阻碍了分析和理论上的创新。<sup>①</sup>不过,近年来潜心耕耘这一领域并尝试理论创新的学者都提出了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最著名的是江亿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和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的《战争与国家形成》。<sup>②</sup>但是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解析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及古代国家形成过程,朝贡体系不是其着眼点。除了最近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麦克关于中越关系的新作,<sup>③</sup>系统研究朝贡体系的国际关系学著作还不存在。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很早就认识到朝贡体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学者认为它是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sup>④</sup>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在使用朝贡体系来建立中国学派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把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考察透彻——它的来源和演变,它作为一种历史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及其相关理论模型的优劣之处。有些学者在讨论朝贡体系时,似乎认为它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历史体系,并把费氏诠释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我认为费氏模型支撑不起中国学派或其他严谨的创新性理论的框架。更重要的是,与其拿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来创建中国学派,还不如先思考如何从理论上解释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历史机制的起源与演化。

理论创新是长期积累的成果。我的目的不在于提出新的理论,而是将重点放在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本身,并由此评估以朝贡体系为核心概念的相关理论模型与观点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分析效用和诠释能力。现有文献中主要存在

---

① 例如: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文版见许田波著《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三种相互关联的朝贡体系的使用方式。本文依次讨论这三种用法,并将焦点集中在费氏模型,毕竟费氏建立了朝贡体系的范式并深刻影响了几代学者。在吸取现有批评的基础上,<sup>①</sup>我尝试对费氏模型做出一个系统的评价。因为费氏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展开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学术体系有诸多缺陷并不奇怪。<sup>②</sup>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指出现有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核心是对费氏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进行新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的可能性。费氏认为“每一个重大的课题都值得每一代人去重新研究”,<sup>③</sup>并对没有人有意识地去改进或者推翻他的研究感到失望。<sup>④</sup>在费氏基本研究成果发表半个多世纪后,中西方学者都有义务来重新评价这一开创性的学术体系,并把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我的基本论点是,现有文献中三种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方式或观点都有内

---

① 这些批评包括: Joseph F.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206-224;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1974); John E. Wills,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John E. Wills, Jr.,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Qi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Neptune*, Vol. 48 (1988), pp. 225-229;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1;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ames A. Millward, “Qing Silk-Horse Trade with the Qazaqs in Yili and Tarbaghatai, 1758-1853,”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7 (1992), pp. 1-42;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51-77;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Exchange?” in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Curzon Press, 2003), pp. 351-372.

② 参见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③ 同上书,第56页。

④ 感谢 Paul Evans 教授对此提供的信息。

在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必须认识到,朝贡体系在成为一种事实描述对象之前首先是一个学术概念;它是“一个用于描述目的的西方发明”。<sup>①</sup>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考察这一西方发明的有用性。虽然这一概念明显抓住了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及其邻邦之间以礼制交往为主要特征的朝贡关系——多年来对它的过度强调也使我们的研究在理论及实证上产生了偏颇与缺失。一个单一的朝贡体系的视角,不管其发展得如何完善,都无法拥有完全的解释力,因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并不局限于封贡及其相关的行为方式。

### 一、关于朝贡体系的三种观点

从19世纪开始,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无法有效应对西方挑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清朝以天下观为基础、以朝贡礼仪为手段的僵硬外交。从那时起,他们就把朝贡体系与传统中国外交联系起来,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一整套独特的思想、礼仪与制度被统称为朝贡体系,并认为这是导致晚清外交顽固不化并致崩溃的根本原因。不过,朝贡体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一直要到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对它进行系统的诠释和发展后,才成为东亚外交史研究的核心概念。除了费氏模型之外,现有文献中另有两种对朝贡关系的诠释与研究方法。

#### (一) 费氏诠释

费正清对朝贡体系的诠释影响最大,不仅一度风靡欧美学界,也深刻影响了中日韩等东亚学界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sup>②</sup> 但是费氏框架也广受批评,近年来学者普遍认为费氏将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简单化与理想化。即便如此,任何这一领域的学者还是无法绕开这一学术构架。本文将对费氏模型作批判性反思,本小节先介绍其基本内容,之后两大节将指出其在概念和史实上的

---

<sup>①</sup>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63-89, at p. 63.

<sup>②</sup> 参见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9月第3期。

主要缺陷。

费正清和邓嗣禹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媒介”,并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是“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之机制”。<sup>①</sup>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费正清在之后的著作中将东亚国际秩序解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即所谓的“中国的世界秩序”。

费氏模型的一个核心假定是“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中华帝国自称的中心性和优越性。<sup>②</sup>从华夏中心主义出发,中国统治者要求外邦承认其优越性。费氏因此认为中国与其他政体之间的关系是“等级式的和不平等的,就像中国社会本身”。<sup>③</sup>古代东亚秩序因此“在理论上是被中国天子的普世优越性所统一与中心化。其组织方式并不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统治者之间以领土为单位的统治,而是所有地方政权从属于中国皇帝令人敬畏的中央权威的方式”。<sup>④</sup>这一关系的等级性基于中华“上国”与其“藩属”在文明与物质优劣性上的差距。要想与中国建立关系,就必须尊重这一等级性并承认中国的优越性。因此,“如果外邦想要与中国建立关系,中国就期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使它们成为朝贡国”。<sup>⑤</sup>

关于行为动机,这一模型提出,中国统治者建立朝贡关系是因为外邦朝贡能给予其统治带来威望,外邦愿意朝贡则是因为它们希望通过朝贡打开与中国贸易的渠道。因此,“贸易与朝贡是同一对外关系体系的相关的两个方面,中国统治者更加看重朝贡的道德价值,而蛮夷们则更看重贸易的物质价值”。<sup>⑥</sup>“朝贡的道德价值”意味着对中国统治者来说,外邦朝贡的功能在于证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对外邦统治者来说,贸易是最重要的动机,“以至于这一整套机制

---

① Fairbank and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pp. 137, 139.

②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p. 1-2. 也可参见 C. P. Fitzgeral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and John Cranmer-Byng,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3 (Jan.-Mar., 1973), pp. 67-79, at p. 68.

③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2.

④ *Ibid.*, p. 9.

⑤ *Ibid.*, p. 4.

⑥ Fairbank and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pp. 140-141.

(指朝贡体系)从外部看来就像为商贸而设的巧妙工具”<sup>①</sup>而且“朝贡使团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贸易的一种工具”。<sup>②</sup>

另外,文化吸引力和德治是中国施展影响的主要方式,“外邦统治者在参与中国世界秩序时需要通过遵守相关礼仪与中国天子打交道”。<sup>③</sup>“中国世界秩序”因此是一个卓越的文化体系,主要通过双方的文化规则和实践来维持,其中最重要的是遵守中国礼制。

很明显,费氏模型的目的在于描述并诠释从中华文明开端一直到19世纪这段历史长河期间中国与其邻邦之间的官方关系。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作为历史学家,费氏并没有想通过朝贡体系的概念建立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论。他“并不想建立关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理论并且多次对抽象理论表示反感”。<sup>④</sup>费氏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如何定义并理解中国世界秩序及其核心特征;也是为此他才强调中国统治精英奉行的华夏中心主义。他恐怕从来没有为自己定过要建立能够诠释整个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综合性框架的目标。<sup>⑤</sup>他的研究方式是先提出一些基本概念来指导具体的历史分析,并期望这些概念能在未来研究中得到改进与发展。因此,对他的模型评价的标准,应该在于其朝贡体系及中国世界秩序的概念与范畴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体现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精华。对其缺陷的认识则能启发我们研究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新思路。

### (二) 中国史学界的制度史方法

朝贡体系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史学界关注的对象,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中国史学界的研究传统是把研究主题定位于朝贡制度,也就是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官僚制度。<sup>⑥</sup>研究重点是中国历

①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p. 137.

② Ibid., p. 145.

③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10.

④ Evans, *John Fairbank*, p. 5.

⑤ 感谢陈兼教授指出这一点。

⑥ 代表性著作包括: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朝与外邦交往的礼仪与规章制度在组织与功能上的演变,即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官僚体制及文化表述的历史发展过程。例如,研究明朝朝贡制度,就需要研究包括朝贡礼仪、贡期、贡道、贡物、朝贡贸易、朝贡组织及管理机构等在内的一整套官僚制度。

这一研究方法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它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制度性建设,忽视了中国与外邦之间的互动。朝贡体系成了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朝贡制度。这样的朝贡制度只能说是中国对外关系官僚制度方面的体现,无法作为理解中国与外邦之间相互的综合性关系的基础。使用这一研究方法的学者,有时有一种过度强调朝贡关系中礼节性和象征性成分的倾向。例如,李云泉在对朝贡制度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分析后,认为中国统治者在乎的主要不是朝贡关系的实质,而是其表象以及其在证明中国优越性方面的作用。<sup>①</sup>虽然这指出了朝贡关系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不能作为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一个总体性概括,因为中国对外关系包括了但不仅限于朝贡关系。

把朝贡体系单向化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官僚式管理,对于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演变是很重要的,特别值得研究的是朝贡制度在历朝官僚化的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无法说明中国与邻邦之间的综合性关系。而且,过度强调朝贡制度的官僚性特别是礼仪,容易产生朝贡关系只是象征性的礼仪关系的假象,从而忽视中国对外关系中灵活和实用的重要方面。最近有史家呼吁,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研究必须同时包括思想、制度与政策三个方面,可谓切中了当下研究的要害。<sup>②</sup>

### (三) 国际社会机制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学者把朝贡体系看作古代东亚国际社会的机制。古典英国学派对机制的定义是“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一套习惯与实践”。<sup>③</sup>从这一视角出发,张勇劲提出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秩序的根本性机制。他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世界秩序内部体现了哲学假定与机制实践,并

①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

② 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74.

且组织了中国与其他‘中国治下的和平’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它们的合作的根本性机制”。<sup>①</sup> 中国与其邻邦是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的。因此，朝贡体系体现了像华夏中心主义这样的文化假定，并且描述了外邦向中国进贡及中国对外邦的回赠与册封等规范与实践。

作为一种英国学派意义上的国际机制，朝贡体系成了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诠释因素。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打开了新的理论视角，却也导致了新的分析性问题。首先，虽然朝贡体系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唯一机制。单靠朝贡体系本身不足以说明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全部形态。英国学派通过对欧洲历史研究而概括出的其他国际机制（如战争）在东亚历史上也存在过，而且东亚可能出现过欧洲不曾出现过的国际机制（如和亲）。所以，我们不可因为过度强调朝贡体系的意义而忽视了其他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机制。

采用机制视角的第二个问题是国际机制本身也需要解释。<sup>②</sup>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建立朝贡体系及其他政体参与朝贡体系背后的动机、利益与战略，我们就需要首先解构并且解释朝贡体系本身。问题不在于朝贡体系能否被看成一种国际机制，而在于这样一种理论视角能够带来多大的解释力。

第三，把朝贡体系看作一种国际机制而忽视其历史演变容易给人一种假象，即朝贡体系是一种固化的、一成不变的系统。但是，实际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朝贡体系在基本特征与行为实践上差别巨大。因此，在讨论朝贡体系时，经常需要指明是指哪个朝贡体系。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贡体系之间的异同非常必要，否则就无法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演变的本质。这也揭示了单一的机制视角在解析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上的不足之处。

上述三种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视角，在具体论点和学术史进程上都有一些明显的关联性。比如，英国学派把朝贡体系当作国际机制的视角就与费正清把朝贡体系当作中国对外关系的媒介的论点非常相近。本节已经对朝贡体系研

---

<sup>①</sup>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and Ken Booth, eds.,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3-63, at p. 57.

<sup>②</sup> 参见 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究的中国史学界制度史方法与英国学派机制视角作了初步的评价,下面将在继续深化这些批评的同时集中对费氏模型进行评价。

## 二、费氏模型的内在缺陷

本节探讨费氏模型在逻辑上的严密性与一致性,提出关于这一模型的诠释力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这一模型的假定的适用性程度。诠释性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核心假定;假定越切合实际,论述也会越合理有用。第二,这一模型的内在逻辑是否清晰一致?逻辑混乱的模型反而会阻碍对具体事例的分析。第三,这一模型的阐释力有多强?

### (一) 假定

上节已经提到,费氏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华夏中心主义,即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已知世界的中心且在文化上和物质实力上都要比周边政权优越。从这一假定可以推断出,中国会设法让外邦通过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方式承认其优越性。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天子自称天下共主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统治整个世界。<sup>①</sup>当时统治精英所谓的天下主要指的是中华帝国周边区域,基本上是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的一部分。台湾学者高明士指出,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世界可以按照中国影响力的递减而分为三个区域:内臣地区、外臣地区及暂不臣地区。<sup>②</sup>中国王朝并不期望把权威扩展到暂不臣地区,甚至还经常平等对待当地的政权。例如,在不同时期,汉对匈奴,隋唐对突厥、回鹘、西藏等部落都曾保持过兄弟间的关系。当这些部落强盛并构成安全威胁的时候,它们被当作敌国而不是朝贡国或属国看待。华夏中心主义的假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太适用。

---

<sup>①</sup>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基金会2003年版,第508页。亦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1页。

<sup>②</sup>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台北喜马拉雅基金会2003年版。

华夏中心主义的第一个问题是其有用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sup>①</sup>按照多数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国统治者从先秦以来就几乎一成不变地奉行中国优越论。但是这种自我优越感的永恒性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表象和假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有一种“把事实与叙述分开的传统”,<sup>②</sup>即使事实变了,话语叙述还可维持原状。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史上,难道中国统治者对外决策时都只是基于华夏中心主义?我们至少应该对中国统一强盛时期与中国分裂弱小时期作一区分,因为物质力量和外部环境对决策经常有决定性影响。王赓武曾指出,中国优越性的话语表述“是基于实力之上的,在弱小和混乱时期它毫无意义”。<sup>③</sup>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史上,中国优越性在很多时期是一种事实,但在另外一些时期则是明显的虚构,是一种自我陶醉、自高自大的迷思罢了。<sup>④</sup>华夏中心主义在决策上的具体效用是受当时的实力状况影响的。中国的“行为和政策可能更多的受事态逻辑的影响,而不是华夏中心主义的朝贡意识形态所引发的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sup>⑤</sup>南宋就得在1138年向比其强大的金称臣。更具普遍意义的是,历朝甚至是强势王朝如汉、隋、唐等,都不得不与西北游牧民族政权建立“兄弟”或平等关系。有学者指出,中国从远古起就有一种必要时与邻邦在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的内在传统。<sup>⑥</sup>

华夏中心主义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假定,因为这时事实或多或少与信念相符。但即便如此,它对政策的影响也需要具体考察。过去很多学者认为华夏中心主义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僵化。但事实并不如此:在不同

① 关于中国优越性观念的演变,见 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Background Essay,”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34-62。

② Wang Gungwu,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pp. 47-65, at p. 62。

③ Ibid., p. 57。

④ Wang,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p. 36。

⑤ Wills,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p. 226。

⑥ 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p. 8; cited in Q. Edward Wang, “History, Space, and Ethnicity: The Chinese Worldview,”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0, No. 2 (Fall 1999), pp. 285-305, at p. 295。

时期,汉、唐、明、清等朝的对外政策都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外向性。<sup>①</sup> 华夏中心主义也并不意味中国就一定要求外邦的臣服,即使是在中国国力强盛的时候。比如,唐朝就没有坚持要日本臣服。<sup>②</sup>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华夏中心主义真的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力,那么为什么这种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思想“并没有转化为全面征服并支配‘劣等’民族的冲动”<sup>③</sup>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可见,华夏中心主义本身对中国支配性政策的存在与否并没有解释力。上述例子说明,华夏中心主义在传统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不可被夸大,而且,它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差异,需要具体分析。<sup>④</sup>

在中国软弱时期,华夏中心主义的具体作用就更为可疑。由于弱小的中央王朝必须考虑其存亡,中国优越性的单一假定必将误导我们对具体事例的分析。上面已经举了宋朝与辽、金关系的例子。在中国积弱的历史时期,我们同时需要中国统治者对帝国安全需求的假定。美国学者卫思韩因此在其关于朝贡体系的著作中强调“防御性”的概念。<sup>⑤</sup> 费正清也认识到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在军力不济的时候维持中国的优势”。然后他列举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目标与手段”。<sup>⑥</sup> 但是他没有把这些想法融入到其模型中。因此,虽然费正清完全了解中国历朝有违华夏中心主义的政策,<sup>⑦</sup>他的朝贡体系模型反映的还是中华帝国的官方观念,在政策形态上则把中国对外关系理想化。另外,这一模型还把中国文化本质化和绝对化,似乎中国统治精英就只能看到自己的优越性而无法认识到文化与外交的复杂性。

在构建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解释框架时,华夏中心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假定,但它不应成为唯一甚或首要的假定。卫思韩就认为从华夏中心主义

---

① Michael H. Hun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42, at pp. 6-7.

② 宋成有《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变迁—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互动关系论述》,台北中央研究院2002年版,第41页。

③ Wills,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p. 226.

④ 有学者指出“传统天下观具有开放和封闭两种模式”。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⑤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Wills,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⑥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11.

⑦ John K. Fairban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47, No. 3 (April 1969), pp. 449-463, at p. 459.

出发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绕过考虑所有证据、所有机制与行为形态的必要过程”并且会“缩短本来应该从建立人类需求与动机的广泛的相似假定出发的诠释过程”。<sup>①</sup>

华夏中心主义假定的第二个缺陷是其片面性或不完全性。费氏模型虽然主要阐释中国对外政策,但也讨论了中国周边政权参与朝贡关系的动机。但是华夏中心主义只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假定,费氏模型既然没有提供对其他政权政策的动机假定,是否就能认为其他政权都乐意成为中国政策的被动反应者而加入朝贡体系呢?是否就能因此认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认同了中国优越论?我们应该如何得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对他们自己对外政策的总体认知?费氏模型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认同了中国官方的观念并遵循了中国的要求。<sup>②</sup>

最后,华夏中心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文化上的假定。这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界以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为核心诠释因素的学术倾向。<sup>③</sup>但是之前已经指出,即使对于中国强盛时期的对外政策而言,单纯的文化假定是不够的。社会文化解释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它们需要由其他因素支撑的并在其他层面展开的解释来补充。

在分析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时,有时另一潜在的假定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国家的政策极其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一套独特的、有别于西方体系的语言和分析工具来解释中国对外政策。当前的一些中国学者似乎有这种倾向。这反映了希望开辟新的途径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学术愿望,这种意识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从这种希望独立于西方、与西方学术平等对话的愿望本身,并不能反推出古代中国对外政策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差异性当然存在,但同时恐怕也存在着相似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同时受到文化、实力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古代中国也不是例外。诚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实力、安全、利益这些概念的理解会有差异,但这些概念无法被完全化约为文化。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进步,需要从对中国或东亚特殊性的假定扩

<sup>①</sup> Wills,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p. 226.

<sup>②</sup> 基于中华中心主义,费正清写道“粗野的外来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的愚钝,无法不欣赏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并很自然的寻求‘来化’以分享其中的好处”。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p. 132.

<sup>③</sup>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9.

展为对不同地区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 (二) 逻辑

费正清似乎并没有下意识去建立关于朝贡体系的一系列表述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论点之间有时互相矛盾,需要进一步澄清之处甚多。比如,他强调中国建立朝贡关系主要是为了自卫,但又指出朝贡关系也可被用作扩张。“大致而言,宋朝使用朝贡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但元朝将其用为扩张,清朝则用其促进外事上的稳定”。<sup>①</sup>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该如何解释不同朝代在使用朝贡关系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如何理解中国优越性的假定与中国统治者将朝贡用作防御、扩张与稳定之间的具体关系?从朝贡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中归纳出一个一般化的朝贡范式也许是可能的,但是费氏并没有这么做也可能没有这么做的意图。但他似乎又想将其有限的、主要是从清朝中后期的历史中归纳出来的朝贡模型应用到之前的历史中去,这就暴露了其原有模型的局限性。这提示我们,如果把朝贡体系看作是一种历史机制,首先必须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形态,然后再通过比较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异同得出一般化的结论或框架。这是历史归纳的研究方法。或者也可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本文后一节会略有论及。

费氏模型在逻辑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其对中国世界秩序等级性的语焉不详。费氏将等级性看作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没有进一步的阐述。最近韩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康燦雄对东亚国际关系等级性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sup>②</sup>但总体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等级性的起源与条件、稳定的因素及其对体系内成员行为形态上的影响都所知甚少。就费氏而言,虽然等级性从中国的角度容易理解,因为中国统治精英相信中国优越论,但其他政权是如何认同并从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的呢?费氏所强调的儒家文化是否足以建立这种等级体系?费氏所指出的另一动机——贸易——是否足以使外邦承认中国的优越性?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指

<sup>①</sup>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p. 137.

<sup>②</sup>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Spring 2003), pp. 57-85;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出,中国的邻邦——从日本到越南——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思想;不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论与中国优越论有在同一历史时期并存的现象。<sup>①</sup> 朝鲜就把自己看成小中华,根本看不起夷狄之邦的满清。<sup>②</sup> 华夏中心主义到底是否、在何时、且以何种方式成功克服了其他政体各自的中心论,至今还未有过详尽的研究。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缺乏对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建立的可能机制的研究。另外,上面已经指出,费氏指出传统中国对外政策有一系列不同的目的和手段。<sup>③</sup> 那又如何把这些不同的目的和手段整合到一个逻辑连贯的框架中去呢?由此可见费氏模型漏洞之多。

### (三) 诠释范围

从表面上看,费氏模型似乎想诠释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所有方面,因为朝贡体系被定义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但是细看其表述,则会发现它讨论的大多是中外朝贡关系中礼节性的一面。同时它又将重点偏向于中国文化圈,即中国与朝鲜、越南、日本及琉球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虽然重要,中国与西北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政治史上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经常伴有冲突和战争,和平的朝贡关系也是存在的。任何朝贡关系的框架都必须把这些关系考虑进去。另外,费氏的讨论局限于朝贡的意义以及朝贡与贸易的关系,但是朝贡和贸易并不是中国与外邦之间关系唯一的甚或最重要的部分。费氏模型因此忽视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多样性。中国与其他政权交往时相互政策背后的动机、方式和战略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被深入探讨。费氏模型把朝贡体系看作一个世界秩序,但它的核心问题却局限于朝贡关系中礼节方面的一小部分。

这个模型本身也带有一种学术上的华夏中心主义。它把分析焦点集中在中国对外政策上,而对其他政体的政策只是一笔带过,这就限制了它对双方关系互动的诠释力。<sup>④</sup> 另外,由于深受华夏中心主义的影响,它有一种从中华帝

① Wang,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p. 60.

②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书城》2004年第9期。

③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13.

④ 这一“中国偏向”是相关文献中的通病。

国官方角度描述东亚政治的倾向。这无疑与费正清过度依赖中国官方文献有关,这些文献几乎无一不将外邦来使描述为向中华皇帝进贡的贡使,从而将朝贡关系普遍化和理想化。

总体而言,费氏模型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一个静态的框架,缺乏变化的意识,反映的主要是中国朝廷希望看到的世界秩序”。<sup>①</sup>在这样一种僵硬的框架下,它把主要分析空间集中在朝贡关系的礼节性方面,如册封、封典、贡献礼品与方物、回赐、叩头、贸易特权等等表现形式。这难免使人疑问:难道朝贡体系就只有这些内容?难道中国与其邻邦在外交上就只限于这些礼节与形式?费氏模型根本忽视了双方关系的灵活性、双方态度与政策的演变以及它们动机与战略的多样性。很多历史学家因此批评这一模型为“单调的”、<sup>②</sup>“单一的”、“不变的”。<sup>③</sup>

### 三、费氏模型与明前期东亚政治

不管是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官僚管理制度还是一种国际机制,朝贡体系在明朝,特别是洪武(1368—1398)与永乐(1403—1424)两朝,达到了一个全胜时期。<sup>④</sup>因此可以恰当地把费氏模型拿到这一时期来检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对费氏模型而言是一个“容易通过的检验”。如果在这里出现问题,这个模型的一般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本节将用洪武与永乐两朝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及蒙古部落之间关系的例子来检验费氏模型的有效性。下面提出的三个问题是:在这一中国强势时期,华夏中心主义的假定在具体政策分析上有多大用途?这一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准确描述了中国与邻邦之间的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诠释了双方政策背后的动机、目的与战略?

---

<sup>①</sup> Wang Zhen-p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fore the Eleventh Century: Modes of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Re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9). See also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p. 66.

<sup>②</sup>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sup>③</sup>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 158.

<sup>④</sup> Fairbank and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p. 137;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p. 13;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p. 14.

### （一）华夏中心主义假定

华夏中心主义对于像前明这样统一与强盛的时期是一个有用的假定。洪武与永乐皇帝总体上都从中国优越论的角度出发,希望邻邦向其称臣进贡。<sup>①</sup>不过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比如,约瑟夫·弗莱彻很早就指出,永乐皇帝在1418年写给帖木儿王朝的一封国书中并没有从中国天子居高临下的口气出发,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与对方地位相当的君主。<sup>②</sup>

这个例子表明,华夏中心主义并没有妨碍中国统治者采取实用的政策以达到具体的目标。因此,即使在中国强势的情况下,“如果外邦想要与中国建立关系,中国就期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使它们成为朝贡国”的论断也是不成立的。费氏模型给定的中国对外的僵化态度,没有给中国外交的实用性和灵活性留下足够的空间。这里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它没有考虑到中国也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一样需要处理影响其生存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实用主义在对外政策中的成分完全可能超过华夏中心主义。要想确保安全及其他目标,中国必须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而不是沉迷于华夏中心主义。<sup>③</sup>

### （二）描述的准确性

费氏认为外邦只能在作为朝贡国的情况下与中国建立关系,并认为遵守中国制定的礼仪程序是朝贡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否是明前期东亚国际政治的真实写照?

总体而言,这一论述对中朝关系是成立的,但在中日与中蒙关系上则暴露出很多问题。洪武和永乐曾多次派使者催促日本与蒙古称臣纳贡,但在很长时期内不同的日本统治者及蒙古部落首领都拒绝向明廷进贡。1411到1424年间,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持断绝了日中之间的交往。在此之前,《明史》所称的“日本王”良怀甚至处决了洪武派去的使者,并在一封“国书”中称“盖天下

① 这一时期的官方话语可见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②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p. 214.

③ 王赓武指出,在历史不同时期中国有着“一种完全实用与灵活的对外政策”。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p. 43.

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sup>①</sup>公开挑战华夏中心主义。洪武时期的前元残余势力—北元—拒绝明廷的招降,永乐时期瓦剌部首领马哈木和鞑靼部首领阿鲁台只是断断续续地,在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情况下向明廷进贡。<sup>②</sup>因此,日本与蒙古只能说是明前期朝贡体系短暂的、极不完全的成员。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与史实的出入并不能构成对费氏模型的挑战,因为日本与蒙古拒绝进贡只能说明它们本身就不在朝贡体系之内,因此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在费氏模型诠释范围之外。如果所有的对外关系都必须受中国朝廷认可的官方关系,那么基于上述逻辑的辩护可能成立。<sup>③</sup>但是,这么狭隘地去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只会降低这一模型的适用性和有用性。即便日本与蒙古没有正式参与官方的朝贡体系,它们与明朝还是保持着陆续的、值得研究的官方或非官方的交往。例如,义持在1418年给永乐的国书中否认其对倭寇的任何责任,<sup>④</sup>良怀处决中国使臣并公开挑战华夏中心主义,蒙古部落抵制明廷的政治军事压力并反之以军事挑战,<sup>⑤</sup>这些都是这一时期中日、中蒙关系的重要体现。如果朝贡体系的框架不能包括这些内容,那么它的有用性就极为有限。

中国与其邻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官方层面的朝贡关系,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也不只是围绕封贡而展开。我们的研究视野必须跨越朝贡,在深入理解朝贡本质的同时也要研究非朝贡关系。费正清不大可能认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只是朝贡,但是和其他很多学者对朝贡的过度关注,给人一个朝贡关系无所不在甚或是唯一重要的中外关系的假象。他的模型因此忽视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其他重要的部分。朝贡体系不是唯一的对外关系的媒介,更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正如卫思韩所言,“朝贡体系并不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而且可能不是综合理解这些关系的最重要关键。关于早期中外关系的西方文献可

---

① 章培恒、喻遂生编《明史·第十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727页。

② 相关史实参见 Wang Yi-T'ung,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and Edward 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但是必须指出,所谓所有官方关系都必须基于朝贡也是有例外的。例如,朝贡并不是清朝与中亚游牧部落建立官方关系的唯一方式。参见 Ning Chia,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4, No. 1 (June 1993), pp. 60-92, at p. 80。

④ Wang Yi-T'ung,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pp. 52-53.

⑤ 参见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能过分强调了朝贡使团”。<sup>①</sup>

明前期的朝贡体系,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机制,只涵盖了中朝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与中蒙关系的一小部分。中国与其邻邦之间很多重要的互动都发生在朝贡体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能做出1368到1842年间“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都在朝贡体系中进行与体验”<sup>②</sup>的论断。

### (三) 诠释力

费氏模型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诠释论述的精确性。它提出中国与其他政体建立等级制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为了政治威望和防御,外邦向中国进贡则主要觐贸易机会。中国统治者施加影响力的主要方式是儒家文化和德治,或借用当前的时髦用语,中国是通过软实力实现万邦来朝的盛景,中外关系中因此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成分特别突出。而外邦统治者之所以认可、遵行中国的礼治是出于他们想与中国贸易而获利的私心。

但是,明朝皇帝要求建立朝贡关系的动机,除了政治威望与合法性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边疆安全。外邦进贡的动机也不只是贸易,还在不同时期包括生存安全、政治合法性、经济利益及军事保护,蒙古部落甚至利用与明廷的关系试图建立草原霸权。明廷也不仅仅是依赖儒家文化来施展影响力,而是同时使用了硬实力与软实力来获取外邦的顺从。同时,外邦统治者也没有温顺地遵守中国的要求,而是在不同时期违反了天朝礼治以达到其各种私利。费氏模型无法涵括这种多样性。

要想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我们必须对中国与其他政体相互政策背后的动机、目的与战略有所了解。费氏模型将中国的动机简化为政治威望,目的简化为政治军事防御,战略简化为文化劝服。但是这三者并不能概括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性与多样性。以下以明朝与其模范朝贡国朝鲜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

1369年1月,洪武遣使到朝鲜建立朝贡关系。因为明朝是在与前元的武

---

<sup>①</sup>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p. 4.

<sup>②</sup>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4), p. 13.

力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洪武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其政权的合法性。<sup>①</sup>他的主要关切,是从外邦获取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央性的明确承认,从而印证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sup>②</sup>此类的朝贡关系虽然对朝鲜的内政没有任何干涉,但也体现出洪武希望控制朝鲜对明关系的意图。

虽然合法性是洪武第一次遣使朝鲜的主要动机,但是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之后他把主要关注点转移到了东北地区的安全局势上。明廷一直要到1387年才平定辽东。在此之前,由于辽东受蒙古部落控制,且有女真族人居住在朝鲜边境,朝鲜在辽东上也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并曾在1370与1371年间发兵辽东。在朝鲜发兵之前的两年,洪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化传统及历史先例来说服朝鲜接受朝贡关系,但朝鲜的军事行动使洪武认识到朝鲜也是一个安全威胁,并开始用强硬手段向朝鲜施压,甚至逼迫其接受明廷要求。例如,在1374年,洪武把朝鲜贡使进贡的频率从一年一次缩短为三年一次,这很可能是为了获取朝鲜在辽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让步。<sup>③</sup>其后,在李成桂推翻高丽王室建立朝鲜王朝后,洪武拒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也是想以此迫使朝鲜在辽东安全问题上让步。有学者指出,洪武希望得到的是朝鲜的“完全顺服”。<sup>④</sup>

洪武因此在对朝政策中同时使用了文化说服力与威逼强制力。永乐皇帝的对朝政策则要相对宽松,主要使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诱惑力来维持朝贡关系。例如,他释放了洪武时期被关押在南京的朝鲜贡使,赐以朝鲜使团大量礼品,甚至提出要娶朝鲜王室通婚。<sup>⑤</sup>在对蒙古部落的政策上,洪武与永乐都进行了大量的战争,特别是永乐曾五次亲征蒙古。<sup>⑥</sup>明朝皇帝使用的这一系列战略与费氏模型对中国对外政策单一性的诠释形成了鲜明对比。

费氏模型认为外邦进贡的主要动机是贸易,且主要通过迁就顺从的方式在

---

① 黄枝连《东亚的礼仪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②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 112.

③ John D. Langlois, Jr., "The Hung-wu Reign, 1368-1398," in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66.

④ Donald Neil Clark, *Autonomy, Legitimacy, and Tributary Politics: Sino-Korean Relations in the Fall of Koryŏ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Yi*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8), p. 136.

⑤ 黄枝连《东亚的礼仪世界》第280页。

⑥ 参见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朝贡的框架下开展对华关系。但是,朝鲜、日本及蒙古部落在明前期的政策动机包括了生存安全、自立性、经济利益甚至草原霸权;它们的战略应对则反复于顺从(当它们参与朝贡)和抵制(当它们拒绝与明廷建立官方朝贡关系)之间。

即便是像朝鲜这样的模范朝贡国,也没有总是顺从明廷的要求。当他们认为明廷的要求太过分或者这些要求危害到了朝鲜的核心利益(如北方疆域安全)时,朝鲜君臣就会采取抵制的策略。例如,朝鲜没有按洪武的要求卖战马给明廷,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想保存战马储备以备不时之需。<sup>①</sup>当明廷的要求触犯了朝鲜的核心利益,如政权独立与存亡时,朝鲜甚至会以军事挑战的方式进行反击。最重要的例子是高丽王室在1388年决定对明先发制人性攻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当时朝鲜君臣错误地认为洪武关于铁岭领土的政策是在觊觎朝鲜领土并正准备侵略朝鲜。<sup>②</sup>永乐朝时期,朝鲜对永乐在女真领地的政治渗透也给予了坚定的反抗,因为他们认为女真领地是朝鲜传统的势力范围且对朝鲜安全利益至关重要。<sup>③</sup>

蒙古部落则在经济利益、政治威望及军事保护的动机下充分利用了它们与明廷时断时续的朝贡关系。鞑靼和瓦剌两个部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明廷的政策来加强、保护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希望能消灭对方部落从而建立草原霸权。限于其生产方式,蒙古人本身的生产实力和财富积累有限,而经济与军事上的物质力量又是巩固部落实力的基础,蒙古人因此希望能够从与明廷的朝贡中获取经济与军事利益。明蒙关系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每次双方战事结束不久,蒙古人就来明廷朝贡。化敌为友速度之快,恐怕只能从蒙古人希望在保存实力的基础上获取经济及军事利益以便进行下一轮的部落之间的较量这样一种考虑来解释。

此外,蒙古部落也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直接挑战明朝的权威。而且它们对明朝的侵犯通常是在多年向明进贡获取经济军事好处而实力大增之后发生的。瓦剌部首领马哈木开始在1413年挑战明朝,<sup>④</sup>鞑靼部阿鲁台则在1422与1424

① 黄枝连《东亚的礼仪世界》,第373—375页。

②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600-1601.

③ Henry Serruys, *Sino-Jurchen Relations during the Yong-lo Period (1403-1424)* (Wiesbaden, 1955).

④ 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第19页;章培恒、喻遂生编《明史》,第6862页。

年间频繁犯边。<sup>①</sup> 他们挑战明朝,主要是因为明朝在北疆的政治军事优势构成了他们建立草原霸权的主要障碍。

因为费氏模型的着眼点主要是朝贡关系的礼仪方面,它就忽视了中外关系背后这些复杂多变的动机和战略。不过,必须指出,费正清对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也有认识。例如,他曾多次(特别是在中国对外关系目标与手段的表中)间接承认清朝与中亚的关系要超出朝贡关系的范畴。<sup>②</sup> 但是,在他指出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中,包括军事征服、行政管理、外交操控及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只有最后一项才与他的朝贡体系框架完全兼容。也就是说,他没有进一步在这些复杂性的基础上改进他的框架。虽然他明确指出“中国世界秩序只是在中国这端而且只是在规范的层面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一种理想化的形态”,<sup>③</sup>他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一重要观点的意义。

马克·曼考尔也指出过“中国政治战略的巨大变化性。”但他把这些变化归因于朝贡体系的天赋。<sup>④</sup> 但问题是,朝贡体系的天赋从何而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贡体系的天赋是需要具体解释的。把中外关系所有变化都归因于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朝贡体系只会阻碍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深入研究。

朝贡及其相关的礼仪形式几乎是费氏模型的全部关注。但是它对朝贡本身具体的政策含义的理解也不够精确及全面。“朝贡的道德价值”和“贸易的物质价值”并不能涵盖朝贡的全部意义。中国统治者建立朝贡体系,既为了政治合法性<sup>⑤</sup>也为了帝国的安全。不同政体向中国进贡的意义不尽相同。进贡并不总是意味着向中国臣服,贸易动机的解释也不全面。<sup>⑥</sup> 近来一系列学者在研究清史时都认为“朝贡”包含了多种贸易与力量关系。<sup>⑦</sup> 例如,濮德培指出,虽然清朝与荷兰、俄罗斯、蒙古、朝鲜及后来的英国之间的关系都能在不同程度

① 章培恒、喻遂生编《明史》,第6836—6837页。

② 参见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 9.

③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12.

④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p. 30.

⑤ 参见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pp. 177-178.

⑥ 参见陈志刚《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本质属性:中原王朝陆基性国土防御体系—以封贡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内部组成、运作规律为中心》,载于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第154—156页。

⑦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Millward, “Qing Silk-Horse Trade;”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上从朝贡关系的角度来解读,但每一个政体与清朝之间的政治和商业关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sup>①</sup> 费氏模型无法涵盖这些朝贡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以,即便是在其理应最适用的朝贡关系领域,它的有用性也是有限的。

费氏模型在明前期的应用上都遇到这么多问题,那么把它应用到整个东亚历史上问题无疑会更多。一个很明显的推论是,这一模型既然对前明这段中国强盛时期都缺乏诠释力,那么它在中国分裂与积弱时期的应用就会更加捉襟见肘。确实,毛里斯·罗萨比很早之前就已经指出“中国世界秩序”没法从公元前2世纪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在积弱的宋代(960—1279),中国对外政策体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因为这时的中国统治者根本没有实力要求外邦按照朝贡体系来交往。换句话说,中国此时无法执行或坚持朝贡的外交框架。宋朝的软弱使其统治者不得不把邻邦看成平等政体,这一时期东亚出现的是一个真正的多极国际秩序。<sup>②</sup> 正如王赓武所言,“当你所能做的只是维持现状,那么很明显也就没有中国世界秩序”。<sup>③</sup>

费氏模型在历史应用上遇到的种种困难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它主要基于晚期的历史经验,并被认为能够解释清朝在应对西方挑战上的失败。但是这模型背后的有些假定可能只适用于晚清而非其他历史时期。即便晚清外交的特征是孤立主义、面子主义及华夏中心主义,<sup>④</sup>也不能由此推断整个传统中国对外政策都是如此形态。

#### 四、超越朝贡体系

上述费正清朝贡体系范式的诸多问题至少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费氏框架的原型。虽然很多学者多年以来对费氏框架多有精彩批判,他们并没有建议放弃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范畴。据我所知,只有美国学者何伟亚有意识地绕过“朝

①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p. 66.

②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③ Wang,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p. 62.

④ 这一描述即便对中晚清而言也可能失之精确。晚清外交政策也有灵活甚至机会主义的一面。参见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1.

贡体系”而构建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后现代主义式的分析。<sup>①</sup>但是,近来中西方学界研究成果一项至少隐含的意义是,我们不能再把朝贡体系看作一种单一完整的系统,而是必须在理论与分析上对其进行解构。濮德培写道“朝贡体系不断经历挑战、瓦解、重组和重建。它从来不是稳定、固定和单一的。对某些地区而言,如朝鲜,朝贡关系相当稳定;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西北边界,存在巨大的波动”。<sup>②</sup>这明显暗示了解构朝贡体系并解释中国对外关系不同程度的稳定性的需要。此外,当前著作中“朝贡体系”、“册封体系”、“封贡体系”、“朝贡体制”、“朝贡制度”等指谓名目繁多,到底该用哪种称谓,如何进行定义,在概念上就甚为混乱。我以为,我们可以对朝贡体系等相关概念进行更严格的定义以便具体分析,但一个更佳的途径则是解构朝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因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而引起的种种问题。

每个朝贡体系都有自己的内容和特征。如果把汉朝作为中外朝贡体系开始形成的第一个历史阶段,<sup>③</sup>之后朝贡体系必然按照不同王朝的特征而演变,并反映不同时期中国与外邦之间关系的变化。不可能存在一个能够贯穿中国历史而一成不变的朝贡体系。即便是朝贡的礼仪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不同王朝对礼仪有着不同的规章和要求。就朝贡关系的本质而言,如果从它在先秦的源头追溯起,西周时期的朝贡是实质性的政治共同体关系:朝贡国即诸侯国,因为分封而具有朝贡资格,因朝贡资格而获得周王室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护。秦汉之后的朝贡是形式而非实质关系,尤其是唐宋以后,朝贡基本上是以中国为文化核心的交往体系加上贸易最惠国待遇,有些类似邻里关系而不再是共同体关系,军事和政治关系非常薄弱且经常仅具道义象征性。<sup>④</sup>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历史机制的演变性:它既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也受不同时期中国统治者面临的不同现实情况的制约。<sup>⑤</sup>必须按照不同时期

---

①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②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p. 67.

③ Ying-shih Yü,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④ 感谢赵汀阳教授指出这一点。

⑤ Wang,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p. 62.

中外关系背后的实力条件、动机与目的的不同,对朝贡体系进行区分考察。<sup>①</sup>

由此也可知,朝贡体系作为一种机制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应变量。如果在机制性的解释框架中把它用作一个自变量,我们必须阐明中国及其邻邦是如何应对朝贡体系的机制所带来的制约与刺激的,以及路径依赖的动态是如何维持它们之间的互动的。<sup>②</sup>但是如果最终这些行为制约与刺激因素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力创造的,那么基于朝贡体系的机制性解释就显得多余且肤浅。如果中国和其他政权都是按照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朝贡关系的,那就没有使用朝贡体系来解释为什么它们之间的互动遵循了机制化形态的必要。我们只需解释它们各自利益的来源以及这些利益如何导致相关的互动形态。朝贡体系则可被看成这些利益与行为的副产品,也就是可以通过它们来解释的现象。作为战略互动的副产品,朝贡体系的内容和特征就会随着中国及其他政体相互的利益与战略的改变而改变。这种同步变化是东亚历史上的常见现象,本文也已略有述及。

但是讨论朝贡体系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影响还涉及一个更深的问题。解释某一时期的朝贡体系并不意味着解释这一时期东亚国际政治的全部。之前已经指出,如果把朝贡体系看作一种国际机制,它并不是古代东亚体系中唯一的机制。所以,要想综合分析、解释中外关系的互动,对朝贡体系本身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在上述明前期中外关系的例子中有明显体现。虽然明朝及其邻邦在交往中使用的某些战略,如文化劝服,可以被纳入到费氏朝贡体系的框架中去,其他战略如战争、胁迫、挑战等则超出了这一框架。当然,没有学者曾认为朝贡体系就是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全部,但是现有文献对它的过分关注还是导致了对其他国际机制与政治形态的忽视。

这提示我们,必须建立能同时解释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朝贡和非朝贡关系的概念与框架。同时,对已有的概念和框架必须抱着批判的眼光去反思其有用性。例如,一些传统的概念如等级性在理解中国对外关系时可能是不够的,至少它在现有文献中的使用是不够深入的。王赓武很早就指出“传统中国与非

---

<sup>①</sup> 相似观点也见于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载于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第15页。

<sup>②</sup> 参见 Craig Parsons, *How to Map Argu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 3.

中国族群之间的交往经常被描述为基于等级性的原则之上。我相信这对理解朝贡体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优越性和安全性或者不可侵犯性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外交机制并没有像研究19世纪历史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死板。”<sup>①</sup>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在思考如何超越朝贡体系范式时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华夏中心主义作为一个核心假定在具体分析时有多少价值?华夏中心主义对传统中国外交有哪些确切的作用?我们在建立分析框架时还需要哪些假定?为什么在某些时期中国对外政策显得死板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则相当灵活?如何解释中国对外政策在动机、战略及稳定性程度上的变化?其他政体与中国交往的动机和战略是什么?从什么意义上能说中国与其他政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等级制的关系?朝贡及其相关礼仪对中国及朝贡国而言各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朝贡和礼仪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最后,中国与其邻邦之间的交往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互动形态?如何去构建能够解释这些互动形态的形成及演变过程的理论框架?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回答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外关系的多样性,扩大研究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理论视野与实证范围。一旦认识到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多样性,朝贡体系范式的不足性就会暴露无遗。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我们需要超越看似无所不包的朝贡体系这一概念,建立底蕴更深、范畴更广、适用性更高、甚至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概念。本文已经反复强调,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概念来解释朝贡体系本身,从而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进行比朝贡体系更为彻底的分析。这些概念,不管是历久不衰的政治学核心概念如权力、安全或文化,还是需要开创的全新概念,都必须要有即能有助于理解朝贡关系也要能有助于理解非朝贡关系,并要能愈合因朝贡体系范式而导致的分析裂痕。如果仅从朝贡体系范式出发,那么为了理解中外关系的综合性,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解释非朝贡关系的框架。显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尝试构建能同时解释朝贡与非朝贡关系的综合性框架。

基于上述讨论,我将初步提议这样一种框架的基本要素,作为解决关于朝

---

<sup>①</sup> Wang,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p. 61.

贡政治的研究困惑的一个出发点。如果跳出费正清的框架,我们可以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对朝贡体系进行解构。<sup>①</sup>第一个层次是把朝贡体系看作是对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一种帝国话语叙述。这种话语叙述在中华帝国历朝几乎是一个不变量。甚至当其他政体威胁、挑战到帝国的安全与生存时,中国的统治者还是使用这种话语来掩盖具体实力关系的改变。杜赞奇把中国用中华中心的普世性话语来遮掩实际存在的不同世界观的行为称为中国的防御战略。<sup>②</sup>在这一层次上的分析任务是解释中国中心话语叙述的稳定性。

在第二个层次上,我们可以把朝贡体系看作中国与其邻邦之间关系的互动形态。但是,相对于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帝国话语的稳定性,朝贡体系作为一种互动形态则呈现了巨大变动性。在中国强盛时期和积弱时期,如唐和宋,朝贡体系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即便同为强盛时期,如前明和前清,朝贡体系的形态也不尽相同。在这一层次上的分析任务是解释朝贡体系作为一个互动形态的变化性。整个关于朝贡政治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框架来同时解释帝国话语叙述的稳定性和中外互动形态的变化性。

构建这种框架的一个方法是对中国统治者设定两种动机假定:合法性(或正当性)和安全性。合法性的动机出于中国统治者维护其天子权威、巩固政权正统性的需要。既然自称天子、自认天下,那么就需要外邦的朝贡来体现中华天朝上国的气象。相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国内基础而言,外邦朝贡能带来的合法性比较有限,但至少这是一种支持性的力量,是政权威望的外在象征和表现。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动机能够解释基于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帝国话语叙述的稳定性,因为不管具体实力条件如何变化,对合法性的要求都是不变的,可能的变化只是这种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强烈程度的不同。例如,明朝刚建立时,洪武四处遣使希望四夷承认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是当其统治逐渐巩固后,朝贡的要求和作用就没有那么明显。永乐篡位夺政,合法性基础脆弱,因此极度希望建立万邦来朝的盛象,四处出击希望建立大明朝的绝对优势地位,派郑和远航也与此不无关系,但其后的明朝皇帝因为有了这种雄心壮志,只要

<sup>①</sup> 感谢布兰德利·沃麦克教授对此的建议。

<sup>②</sup> Prasenjit Duara,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99.

番邦偶尔能来朝贡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合法性动机本身除了指出中国会坚持帝国话语叙述之外,并不足以提示历朝历代会采取何种政策形态。到底这一基于中国中心论的合法性要求会促使中国去征服拒绝接受其中心地位的外邦,还是会因为满足于自我优越论的虚荣而自高自大、自我陶醉,甚至对外邦失去兴趣而采取内向以至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倾向都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但是合法性动机本身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此时我们需要安全性作为另一动机假定,并把这两种假定整合起来,同时在考虑到环境变量(如实力变化)的情况下推论出具体的政策形态。安全性动机的提出基于一个简单事实:中华帝国,和任何政体一样,都必须把生存安全作为核心利益。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到东南沿海的倭寇及后来的欧洲的坚船利炮,历朝历代都经历了无数的安全威胁。

当安全动机与中国在特定时期面临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时,我们就可能推断出中国的政策倾向。例如,一个强盛的王朝(如前明)对安全威胁的反应是和弱小的王朝(如南宋)不同的。前明在推行帝国话语的基础上,还要求甚至在不同时期胁迫外邦进贡。它应对外邦的战略既包括文化劝服也包括武力征伐。而南宋,在对内坚持朝贡话语以保存中华上国的脸面的基础上,对外则需降辈称臣并反向朝贡以维持政权生存。不同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的结构——有助于解释中国历朝为了安全而采取的不同战略。

这样一个初步的框架——通过两种动机假定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对政策行为进行适当推理——能有助于同时解释帝国话语叙述的稳定性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性。类似的思维逻辑可以应用在其他政体的对华政策形态上,从而构建出能够系统解释中外关系互动形态及其背后的动机与战略的综合性框架。这样一种框架,因为同时考虑到了合法性与安全性的动机,所以既能解释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朝贡”的方面,也能解释其“非朝贡”的方面。实际上,这也走出了解构“朝贡体系”范式的第一步。当然,只要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的重大理论与历史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严谨的分析,其他更为合理、强大的理论框架是完全有可能建立起来的。

## 五、结 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现有关于朝贡体系的文献进行批判性反思,并评估基于朝贡体系的模型或框架的理论与分析价值。中西方对朝贡体系的概念应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官僚管理制度,作为英国学派意义上的国际机制,以及费氏模型提出的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媒介。本文主要集中于对费氏诠释的批判,希望能从中得出推进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些启示。

费氏模型有一些重大缺陷。它的内部论述本身缺乏连贯性,无法诠释东亚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希望能阐释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连续性,但是忽视了中外关系中同样重要的变化性。这一模型有着相当的局限性。正如卫思韩指出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所有的外交传统都统称为‘朝贡体系’,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外交传统的所有重要方面及所有冲突的根源”。<sup>①</sup>另外可以指出,这一模型在理解其他政体的对华政策上的局限性更大,因为其分析框架本身也带有明显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

不过,同时也必须强调,费正清多次指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复杂性与其框架兼容性之间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改进其框架。他的框架,正如他自己说的,是一个初步的框架,其贡献在于提出了可供进一步研究的一些核心概念和观点。我的本意不在于过分简化甚至曲解费氏庞大的思想体系,而在于指出其中的问题并探索超越费氏初步框架的途径。一个重要目的,是说明国际关系学者如何能在批判性地吸收费正清及其他学者奠定的对朝贡体系研究的现有基础上,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至少在这一领域,我们需要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之间的有益对话。

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朝贡体系这一概念呢?卫思韩曾提议,如果只把朝贡体系用来指谓1400年前后发展出来的中国官僚制度系统,那么这个术语在概念上就会比较清晰。<sup>②</sup>也许这种概念化过于拘谨。不过,我们在使用这个概

<sup>①</sup>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p. 172.

<sup>②</sup> Wills,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p. 225.

念时至少要明确指出是哪个朝贡体系。如果能明确朝贡体系具体所指,那么它还是能起到描述性的作用。但是,为了防止将其本质化,我们需要将某一历史时期的朝贡体系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不是分析的单元。最重要的学术任务是通过建立另外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朝贡体系在历史上形态的演变。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朝贡体系的层面上。

不过,将某一时期的朝贡体系作为分析对象来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也是不够的,因为这将忽视朝贡关系之外的中外关系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不用朝贡体系这一术语的情况下描述并分析中外关系。朝贡体系本来就是由西语翻译而来,虽然中国历史文献有朝、贡分开和连用的情况,古代中国统治精英恐怕没有把朝贡当作一种系统来看待的思维,至少从相关历史文献中看不出这种倾向。朝贡体系是一个现代西方的学术概念,我们用不用、如何用,要看这个概念在学理上的有用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朝贡体系不是“一个描述古代中国天下观或国际秩序的妥恰术语”。<sup>①</sup>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可以讨论朝贡关系,但不一定非得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下去讨论。关键是理解朝贡关系背后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不尝试去建立一个既能兼容朝贡关系,又能同时解释其他关系的分析框架呢?要知道,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体系比朝贡体系宽广、深厚的多。<sup>②</sup>我们可以在具体研究时提出何伟亚的问题:如果移去朝贡体系,中国与其他政体之间的关系又会变得怎么样呢?<sup>③</sup>长期以来朝贡体系范式垄断了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现在是尝试超越这一范式的时候了。

---

①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03页。另见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② 如罗志田所言“‘朝贡’的确是当年确立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象征,同时还有许多不为‘朝贡’所包含的面相”。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03页。另见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③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p. xi.

## 作者简介

巴里·布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和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电子信箱: [b.gbuzan@lse.ac.uk](mailto:b.gbuzan@lse.ac.uk)

张 锋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2004 和 2009 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分别获比较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任《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编辑。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gmail.com](mailto:fengzhangmc@gmail.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hotmail.com](mailto:nkchenchong@hotmail.com)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 和 2009 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 年)。

电子邮箱: [liufeng00@gmail.com](mailto:liufeng00@gmail.com)

王树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99 和 200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2002 年)、《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2007 年)等。

电子信箱: [wangshuchunf209@163.com](mailto:wangshuchunf209@163.com)

朱 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492765184@qq.com](mailto:492765184@qq.com)

吴文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9 年在电子科技大学获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2007 年在新疆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 [wuwb07@mails.tsinghua.edu.cn](mailto:wuwb07@mails.tsinghua.edu.cn)

刘若楠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9 级硕士生。2009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uruonan.crystal@gmail.com](mailto:liuruonan.crystal@gmail.com)